

XIANGQIN WENXUE FASHENG YANJIU

# 先秦文学

## 发生研究

赵辉 著



人民出版社

XIANGQIN WENXUE FASHENG YANJIU

# 先秦文学



发生研究

赵辉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特约编辑:陈汉萍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千叶书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文学发生研究/赵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7-01-011137-7

I. ①先… II. ①赵…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先秦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4994 号

## 先秦文学发生研究

XIANQIN WENXUE FASHENG YANJIU

赵 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33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137-7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序

赵逵夫

大半个世纪的文学研究队伍,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多;如果从专书方面说,最多的是集中在《诗经》、《楚辞》的研究上,这只要看看有关古代文献的书目就可以知道。至今,《诗经》学会、楚辞学会,仅全国性或国际性会议就各两年一次,每次总有百人上下甚至更多,还有会议圈子之外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每年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书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但《诗经》总共 305 篇,《楚辞》一书共收作品 17 篇,我们将《九歌》看作 11 篇,《九章》看作 9 篇,也只 35 篇,而实际上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在屈原、宋玉等战国末年楚国作家的作品上。而对这数量不多的作品,很多的《诗经》学家、《楚辞》学家每年都要出一些成果,其结果大部分也不外两种情况:一为大量重复劳动,二为猎奇求怪,以求出新。本来也是,要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中做到真正的创新,太难了。所以此前我带了二十几届硕士生,十多届博士生,只有一个以《楚辞》为选题的,以《诗经》为选题的一个也没有。我以为要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中有所创新,必须有相当的学术积累。

所以,我以为先秦文学研究方面,还是视野开阔一些为好,如果要具体研究问题,也可以在前人关注不够的地方下些工夫。这样,既有利于开拓研究领域,也有利于了解先秦文学的全貌。但即使这样,也不是随便可以取得成绩的。前代学者已经指出:学术的发展一是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二是有赖于新方法的运用。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简帛文书,为先秦文学研究的向前推进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也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新的材料毕竟有限,人们在这方面的文章也做得差不多了。所以,从总体方面看,我们还有待于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来审视先秦文学。在这方面,更有待于理论上的

创新。

赵辉教授的《先秦文学发生研究》正是一部从宏观上以新的观察方法和新的研究手段重新认识先秦文学,探讨先秦文学的发生与特质以及对后代文学影响的一部力作。

几十年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套西方理论的框框,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很不相符。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不仅先秦时代的文学是“杂文学”,整个中国的文学都是“杂文学”。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中作为主流的,并非小说、戏剧。诗、词、曲、赋之外,便要数“文”——即一般所说的“古文”,包括议论文、游记,以及史、传、书、序等各种应用文字。现代各种文学史将散文列入其中,似乎是照顾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而格外开恩、破例列入。关于中国诗歌、赋颂、传记等形成的状况及其特质,也并未说清。

赵辉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前一段的研究,学术视野开阔,对一些问题能进行深入思考,其论文《原始宗教与楚辞》、《简论楚辞特质形成的原因》受到楚辞学者的关注,专著《楚辞文化背景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好评。联系他的《从〈诗经〉的“兴”看“兴”的起源》、《唯有文采不成文——先秦“文”的三维建构》、《易象思维的特征及文化表达》等论文和专著《心旅第一驿——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心态之源》等来看,他在近几年中一直在研究思考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同文化、同中国人思维特征的关系。他所承担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神坛、政坛言说与先秦诗赋史论言说惯例的生成》(即《先秦文学发生研究》)正是在以往研究思考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开拓和进一步系统化。

在这部创新性很强的论著中,作者从宗教形态的礼乐言说来寻找先秦文学主要文学体式的原点,从政治形态的礼乐言说来阐述先秦时代主要文学体式、言说惯例的生成,从先秦神坛、政坛、文坛一体化的方面来探究先秦文学表面特征的形成。全书侧重于宏观研究,但以微观上的观察、分析为基础,其中有些地方的论述甚为精彩。如第四章《礼乐政治形态言说与诗赋》对文体“互体”的论述,对歌与诗的起源与原始功能的论述,对礼与赠送酬答诗的论述,对赋的发生历程的论述等,都细致、深刻而饶有新意。他指出,

歌的本质是音乐,具有“非限定言说时空”和口语的性质,诗则不同。他在“诗”字的分析中引述杨树达、闻一多和叶舒宪、刘士林等人之说,指出“诗”字的声旁“寺”原本指祭祀场所,即神坛,并引《楚辞·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王逸注“得升五帝之寺会也”,《九怀》“河伯兮开门”王逸注“水君侍望,开府寺也”等材料,并从古代宫室建筑方面论证之,俱言而有据。于是得出结论:“诗作为在国家中央政治机构之‘寺’的活动产物,显然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限定时空言说’而存在,很少带有歌作为‘非限定时空言说’的特征。”论文指出:“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作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应是礼乐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然而,作者并不是静止地看问题,简单地将先秦诗与歌加以划分,也指出了后来歌与诗观念的合流,同时也指出:“但由政坛这一‘限定时空’言说所产生的原始功能却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诗歌的发展。”分析透彻、全面,也体现出辩证的观点。

可以说,“限定时空言说”理论是在以上探索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我国先秦文学生成演变规律的一种概括,在理论上表现出很大的创新性。根据这个理论,可以明白地将一些难以说清的问题说清,使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现象联系起来,揭示出先秦文学形成中一些内在的原因。赵辉教授在完成这个项目中发表的几篇论文,作为这个项目的中期成果,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赵辉教授请我作序,我推辞而不得,他似乎也看出我一直在思考先秦文学的本源及体式、特质形成等问题。比如关于“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的理解,我在《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中也曾有所论述,<sup>①</sup>但至今还是有人只以汉代以后的观念来理解这句话。赵辉教授在书中详细论述了这句话的含义理解上的变化。我指导的几个博士生也一直在先秦文学的本源及体式、特征的形成等方面进行探索。2001届博士生韩高年的学位论文是《颂诗的起源与流变——三代诗歌的实证与逻辑推演》,后来拓展为《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研究》,作为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出站报告,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前的2004年他还出版了一本《诗赋问题源流新探》;

<sup>①</sup> 参见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02 届博士生罗家湘的题目是《逸周书研究》，后来他也以《先秦文学制度研究》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书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一些以先秦典籍专书研究为选题的学位论文中，也都注意到了先秦文学各体式的形成、特质、对后来之影响等问题。所以，我同赵辉教授也算知音。但近二十年来我侧重于先秦文学基础文献和基本事实的清理，因为 20 世纪大部分学者本着大胆疑古的思想宗旨，虽然推倒了一些虚妄观念，否定了一些被盲目看作经典的东西，但造成的冤案也不少，这些东西不加甄别，也不能反映出先秦文学的基本面貌。事实上，从古代的经学、到理学，到疑古思潮的兴起，学术史上有的问题也一直未能真正解决，陈陈相因的情况差不多存在于古代典籍的各个方面：有因盲目信古之说者，有因轻率疑古之说者。因此，我更多地材料和基本事实的清理方面做些工作。这除了利用新的出土的文献之外，也有一个旧材料的重新发现问题。一本书、一篇文章或一首诗、一篇赋，以往将作者或时代认定错了，在判定其他相关问题时它肯定会起着误导的作用，扰乱视听。而当对它的作者或时代性做了正确的判断，就有益于不少相关问题的解决。这些工作带有微观性、具体性，似乎是属于“形而下”的范围。但事实上，如前所说，我也一起在思考先秦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可以说，我同赵辉教授的工作是“异路同归”，而且也不是“两不相关”。

我同赵辉教授都是属马，但我已是未能识途的老马，于学问仍在探索之中，而赵辉同志当凌风骄腾之时，正所谓“所向无空阔”。他寄书稿来之后，我虽有些杂事不能一口气读完，但也断断续续，大体读完了全书。我觉得，全书材料充分，论证严密，思辨性强，充满新意。我以为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因而写以上感想。或有未当，请赵辉教授与读者朋友正之。

2011 年 6 月 5 日于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 目 录

序 .....	赵逵夫
<b>第一章 礼乐政治形态的言说特征</b> .....	1
<b>一、 隐含的文坛</b> .....	1
神坛、政坛言说的本质是宗教与政治的言说——礼乐制度将宗教、政治和文学艺术结构为一体——先秦文学艺术的言说为宗教、政治的工具——各种文章体裁均为政坛实用文体——诸子为干世主而著书言治乱——先秦的文坛隐含于神坛和政坛	
<b>二、 主体的“自主性”剥夺</b> .....	16
先秦文坛的言说主体即神坛、政坛言说主体——礼乐政治的价值形态将言说主体的自我实现拘限在礼乐政治方面——追求富贵使文人产生了对统治阶级的身心皈依——选举制度将言说主体的独立性完全剥夺——士大夫不过是具有一定特权的“奴隶”	
<b>三、 礼乐政治言说的伦理原则</b> .....	28
礼乐的本质是伦理等级秩序——礼乐政治形态的言说原则为伦理原则——战国礼的等级制度从没崩坏——身份的差异而形成等级言说原则——话语的等级性——合礼的言说必庄敬而“辞顺”	
<b>四、 神坛、政坛的限定时空言说</b> .....	39



礼乐政治仪式言说是典型的“限定时空言说”——仪式言说具有特定场合、言说主体、言说对象及其构成的言说关系——先秦礼乐政治言说多为仪式言说——非仪式言说因言说主体、言说对象的伦理身份形成“非完全限定言说时空”——文坛隐含于神坛、政坛,使文坛言说成为“限定时空言说”——“限定时空言说”也存在于个体经验的言说

- 第二章 礼乐政坛言说中的文、言、乐** ..... 54
- 一、“文”的三维建构 ..... 55
- “文”本为一种宗教仪式行为——“文”的道德含义——“文”是宇宙、社会法则——“文”的生命本体意义——“文”的道德、宇宙社会法则、生命本体意义发而成“文章”——先秦文章意义的“文”专指国家典令和儒家经典——“文道合一”源于先秦“文”的三维建构
- 二、“言”的一元价值取向 ..... 63
- “言”为天地意志和社会制度的实现媒介——作为局部的个体在接受礼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同时将自己投射到全局——战国诸子的“言”的一元价值取向——孔子所谓“言之无文”之“文”的含义为礼乐道德规则——“言”的标准是“不二先王”
- 三、乐的本质 ..... 73
- 乐为礼的结构元素——乐承担的功能为表现礼所规范的伦理关系——乐是大功盛德之果——乐以“和”为根本价值取向——乐的本质是政治工具
- 四、“诗言志”与“功成作乐” ..... 82
- 诗为“乐语”——先秦的诗论实为乐论——论诗之乐论视角——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建立在乐学理论上——“诗言志”原本是一个乐学命题——乐论的价值取向规定了诗论的价值取向——“诗言志”之“志”的内

涵为德立功成

<b>第三章 礼乐政治言说思维的形成及其特性</b> .....	94
<b>一、原始宗教思维与神坛言说</b> .....	94
原始思维不是原始宗教思维——原始宗教思维也伴随情感、想象和形象——原始宗教的心理体验建构在集体表象的基础上——原始宗教思维打破了人与鬼神、自然现象等多方面的界限——神坛的“象性”言说方式因原始宗教思维而形成	
<b>二、殷周政坛与《易》象思维的形成</b> .....	102
《易》象思维适应着周代礼乐政治而形成——《易》象思维带有原始思维和原始宗教思维的特征——圣人“立象见意”是一个综合、归纳、推理的“抽象”准逻辑过程——礼乐政治强调的道德为《易》判断吉凶的重要依据——《易》象思维初步确立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b>三、礼乐的象性建构与表达</b> .....	110
《易》象之“象”融“理”与形象于一体——《易》象构建了天理与人事相对应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对应社会的贵贱高卑之位——周代依天地之象设置官僚机构——礼仪是依《易》象思维结构而成的象喻系统——礼乐因“象”使形而上的礼之“理”具有了感知的品质	
<b>四、《易》象思维与政坛言说</b> .....	118
《易》象思维为“用”而产生又为“用”所用——以象明理使“用”带上艺术色彩——礼乐借象明“理”赋予“用”一定的艺术性并形成礼乐政治言说的“象喻”传统——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象以尽意——赋予礼乐政治形态言说“用、美合一”的特征	
<b>第四章 礼乐政治形态言说与诗、赋</b> .....	129

- 一、文体的“互体” ..... 129
- 坛的功能决定着文体的发生和以功能确定文体的惯例——先秦文体多为礼乐政治仪式行为——言说关系及功能对文体的区分起着决定性作用——功能目的决定文体对语言形式的忽视——文体的“互体”——先秦没有严格的文体
- 二、歌与诗的起源与原始功能 ..... 140
- 歌非“诗”——歌的本质是音乐——寺由祭祀场所演变为中央国家机构——诗为寺这一国家政治机构活动的产物——诗的实用使其借语言文字表意的功能较歌大大加强——诗的本质是政治工具
- 三、礼与赠送酬答诗 ..... 152
- 赠答酬送类诗歌的源头在先秦礼乐仪制——以言赠答酬送是因主体之意难以物尽——外交的赋诗言志为“言”包括诗的赠答酬送摆脱礼的仪式作了全面铺垫——礼的赠答酬送规定了赠答酬送诗的内容与功能
- 四、赋的发生历程 ..... 162
- 赋本为祭祀仪式上向神灵贡献祭祀物品——祭祀主持人一一列举祭祀物品赋予了“铺陈”的意义——赋因铺陈而具有言说方式和文体的意义——宋玉的赋大多登坛而作——登高而赋确立了赋这种体裁的基本形式与赋讽谏、讽喻的惯例
- 第五章 礼乐政治形态的言说与史、论 ..... 177
- 一、西周“文书”叙事与礼乐仪式言说 ..... 177
- 西周的叙事文具有完全叙事、言事相兼两类——西周叙事散文的“文书”性质——“叙事文书”性质多因礼乐仪式而形成——某一特定时空具体场面的记述——少见历史著述的性质
- 二、百国《春秋》叙事功能的转换与礼乐 ..... 188

叙事散文的写作主体兼有史官和礼官的身份——西周的史官不是历史著述家——春秋时期史官的地位、职能随着社会偏重于礼义的转化发生相应转变——史的“守典奉法”职能的极大强化——史家记事由西周记叙礼仪及周王之言和铭功转向提供历史借鉴和防止君臣乱法——孔子《春秋》标题式记事只是一个特例——百国《春秋》完成了向历史著述、重在事件过程和由质向文的转变	
三、《左传》的依礼记事和叙事明礼 .....	203
《左传》的礼学历史观：家国兴衰、邦交和恶、战争胜败皆因礼——礼学历史观决定了《左传》“以礼明事”——礼仪对于细节的重视导致《左传》叙事细化——“言”为“事”之因素——明礼仪与礼义离不开记言	
四、从“史、论同体”到“论、史同体” .....	214
《尚书》、《国语》已有较成熟的论说文——外在叙事框架和“对话式”说理使其具有“论、叙同体”的性质——言说主体的臣子身份使《国语》较《尚书》的“胁迫性说理”更具逻辑性、理由的充足性——诸子论说文的叙事性——同一行为方式是诸子论说文和历史散文“论、叙不分”的根本原因	
附：百国《春秋》佚文考 .....	225
第六章 礼乐政坛言说与文坛言说方式 .....	244
一、礼乐政治与言说方式 .....	245
政治形态君臣关系的言说以臣下之“顺”为根本原则——战国士阶层“义不臣乎天子”的诉求没能使其超越礼乐的伦理原则——政坛言说使臣下处于巨大的焦虑之中——人臣之礼不显谏——“五谏”以讽喻最得礼乐要义	
二、“六诗”、“六义”与讽喻 .....	256
对“六诗”、“六义”的解释产生歧义的原因是学者多以文	

艺为视点——诗的产生与政治功用的实现都缘于美刺的第一存在形态——“六诗”之风雅颂与作为诗之体的风雅颂非同一概念——“风”即借其他人事来说言说对象所做正确与否来进行讽劝——“雅”即庄严地言说——“六诗”是适应礼乐政治形态言说“颜色齐”和“顺辞令”的原则而产生的言说方式

### 三、“春秋笔法”与《庄子》寓言 ..... 273

战国君臣和诸子的言说继承着“六诗”的言说方式——“《春秋》笔法”的核心是“委婉其说”——韩非所谓与君主言说十二种方式与“五谏”相近——《庄子》的寓言、重言是“六诗”言说方式的糅合

### 四、诗+音乐言说的正式性 ..... 285

诗达到歌功颂德的政治和沟通意见的目的不需要音乐——先秦的诗与歌都与音乐融为一体——音乐的通神性和功成作乐的神圣性赋予了音乐的神圣性——音乐的神圣性赋予诗借乐言说的神圣性和正式性

## 余论 文学的“限定时空言论”：从先秦到近代 ..... 298

### 一、社会生活的“限定时空言说” ..... 298

### 二、文学的“限定时空言说” ..... 302

### 三、中国文学研究的检讨 ..... 307

## 主要参考文献 ..... 311

## 后记 ..... 316

# 第一章 礼乐政治形态的言说特征

神坛、政坛、文坛,表面上似乎是三个毫无因缘的独立领域,但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先秦“三坛”之间存在着横向和纵向两种共存关系。横向共存,是说神坛的言说虽是宗教的言说,但其中却包含着政坛和文坛言说的因素;政坛言说虽是君臣关系的政治言说,但其中不仅因袭了宗教言说的内涵和形式,也存在着文坛言说的众多成分;文坛的言说虽然性质不同于神坛、政坛的言说,但由于它同时存在于神坛、政坛的言说之中,并隶属于宗教和政治言说范畴,宗教和政治以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性、崇高性而对文坛言说产生强大的饱和渗透,使文坛言说带上了宗教言说和政治言说的本质属性。而从纵向共存方面说,“坛”就像一条河流,流越宗教、政治、文学的原野。神坛的宗教言说和政坛政治言说为文坛言说的原点,神坛的言说则以其神圣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着政坛言说的内涵与形式,而融解着神坛人神关系言说内涵和言说方式的政坛言说,又以政治赋予它的强大力量支配着文坛的言说,和文坛言说产生反应,催化出文坛言说的惯例。

先秦神坛、政坛、文坛的一体化结构,使神坛、政坛由特定的言说场合和特定的言说主体、言说对象及其构成的言说关系而形成的“限定时空言说”自然成为文坛言说的特征,从而使先秦礼乐政治形态成为先秦文学言说体式、惯例形成的土壤,先秦礼乐政治形态的言说原则成为文坛言说的支配原则。

## 一、隐含的文坛

神坛、政坛言说的本质是宗教与政治的言说——礼乐制度将宗教、

政治和文学艺术结构为一体——先秦文学艺术的言说为宗教、政治的工具——各种文章体裁均为政坛实用文体——诸子为干世主而著书言治乱——先秦的文坛隐含于神坛和政坛

“文坛”，是指文字著述及其活动构成的形态。“文坛”一词，虽不见于唐代以前的典籍，但正如先秦没有“政坛”这一概念，而国家政治形态却已有了漫长的历史。不过，先秦不仅没有独立的文坛，文坛附庸于神坛和政坛，而且文坛也是伴随着神坛和政坛的产生而生成。

神坛伴随着神灵观念的产生而产生。新石器时代，神坛已经出现，距今约 5500 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就发掘出了神坛。据《山海经》，夏代似乎已有普遍筑坛祀神的倾向。《山海经·中次山经》载：“东三百里曰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觴百神也。”“昔者，夏后启葬，享神于晋之墟，作为磬台。”<sup>①</sup>“昔夏后启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钧台枚占。”<sup>②</sup>战国与汉代，这一传统依然保存着。如秦“文公作鄜畤，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下畤，祭赤、黄帝；汉高祖作北畤，祭黑帝”。<sup>③</sup>汉武帝“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sup>④</sup>，“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sup>⑤</sup>。至于巡封，虽在高山，也须立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封禅望祭山川，“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正义”引《晋太康地记》云：“为坛于太山以祭天，示增高也。”“集解”引张晏曰：“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这“立封”即张瓚所注：“积土为封。谓负土于泰山上，为坛而祭之。”<sup>⑥</sup>

神坛的设立，将人和神区分开来了，但意义却不在此，也不在便于对神灵的祭祀。当“坛”在人们的观念中被设置为神灵集止的场所之时，神坛也

① 欧阳询撰，汪绍盈校：《艺文类聚》卷六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118 页。

②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

③ 司马迁：《史记·武帝本纪》“正义”，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53 页。

④ 司马迁：《史记·武帝本纪》，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58 页。

⑤ 司马迁：《史记·武帝本纪》，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78 页。

⑥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42—243 页。

便同时被赋予了无可比拟的神圣性。于是,虚拟的神灵有了一个在现实中确立他们地位和权威的实物标志,将虚幻通过建筑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从而使人们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对神灵神圣性的印象不断强化,确保对于神灵权威的遵从。

政坛是随着政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但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政治中,政治与宗教是合而为一的。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有关朝廷的宫廷建筑的构成因素看,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在夏代就已实行。《周礼·考工记》记载说,夏代有一种建筑被称为“世室”。宋林希逸《考工记解》卷下说: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和周代的明堂,“三代所名虽不同,其实则一”。可知世室、重屋就是周代所谓的明堂。而明堂在周代不仅是祭祀之所,亦是朝廷行政的场所。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

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sup>①</sup>

世室既与明堂的功能同一,那世室也就是集政治与宗教于一体的宫廷建筑。这一点,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宋镇豪曾说,二里头夏代晚期都邑遗址最高一等的是大型宫室建筑,其中三期一、二号两座基址是面积相当大的主体宫室,正殿建筑在高3米的长方形高台上。一号宫室正殿前的大庭,可聚万人以上,适合颁政布令,类于文献说的“夏后氏世室”。位于其东北方100多米的二号宫室,正殿后居中的陵墓是这组建筑群的聚集所在,与正殿、中庭、门塾自北而南呈中轴线摆开,具有后世寝陵制的雏形。墓前的正殿三室并联,类于《尔雅·释宫》所云:“室有东西厢曰庙。”正殿之中室似为庙,可能用于供奉墓主及先王神主,为举行祭祀之所;东西两室似为寝,大概是放置祖先衣冠、生活用具和供物之所。可见,夏代“上层贵族集团的居所已合居住、祭祀、行政于一体”。<sup>②</sup> 知夏代的“世室”实际就是政教合一这一

<sup>①</sup> 《蔡中郎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3册,第180页。

<sup>②</sup>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8页。



政治体制的表现符号。

商代的政权,是一个典型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sup>①</sup>商代的最高统治者,不少是巫,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于一身。据说成汤时的伊尹、太甲时的保衡、太戊时的伊陟、祖乙时的巫贤、武丁时的甘盘等,也都既是国家的高级政治官员,同时也是大巫,如伊陟便是太戊的宰相。

夏、商政治对宗教借重,因历史积淀而形成一种历史定势,制约着周代政治格局的构成。这种制约,最充分地体现在周代礼乐制度的政治格局的建构上。《礼记·明堂位》载:

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sup>②</sup>

这一记载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但根据《国语》、《左传》、《周礼》等历史典籍的记载看,西周已实行礼乐制度,周代实行的为礼乐政治制度当是无疑。而周代礼乐政治制度的原型,是夏、商以来在原始宗教祭祀过程中的礼仪。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sup>③</sup>孔子的话不仅说明周礼对于殷礼的继承,同时也说明了继承程度很高。尽管周礼添加了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政治、法律、宗教、经济、官制等诸多新的要素,但宗教祭祀仍是礼乐制度的核心,礼乐制度仍以祭祀礼仪为主要表现形态。《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sup>④</sup>这里的“五经”,即吉、凶、军、宾、嘉五礼。“莫重于祭”一是说明五礼由原始宗教祭祀礼仪发展而来,如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说:“礼之起,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

①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2页。

② 《礼记正义》卷三十一,《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8页。

③ 朱熹:《论语集注》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④ 《礼记正义》卷四十九,《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02页。